

胡也頻選集

810
4742

新文學選集
胡也頻選集

開明書店

胡也頻選集

每冊售價人民幣 19.500 元

己(環 8779)

著者	胡也頻
編輯者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茅盾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 383 弄 32 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 66 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51 年 7 月初版(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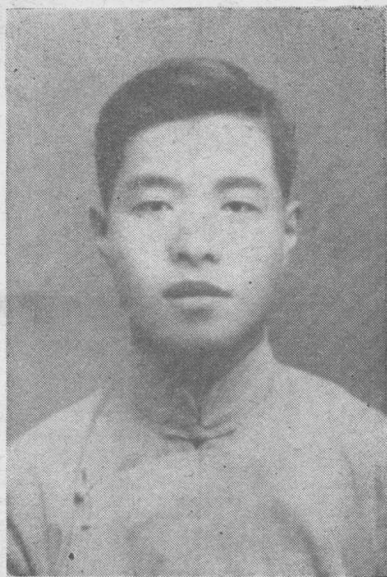
181P 27K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胡也頻先生遺像

(一九二九年攝)



在少年時代攝

願生

胡也頻詩集

1925—1926

手 蹟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個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選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爲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輯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丁玲

——記胡也頻

記得是一九二七年的冬天，那時我們住在北京的漢花園，一所與北大紅樓隔河、並排、極不相稱的小樓上。我們坐在火爐旁，偶然談起他的童年生活來了。從這時起我纔知道他的出身。這以前，也曾知道一點，卻實在少，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奇怪，不知爲什麼他很少同我談，也不知爲什麼，我簡直沒有問過他。但從這次談話以後，我是比較多了解他一些，也更尊敬他一些，或者更恰當的說，我更同情他了。

他祖父是做什麼的，到現在我還不清楚，總之，不是做官的，不是種地的，也不是經商的，收入卻還不錯。也頻在幼小時，因爲身體不好，曾經長年的吃過白木耳之類的補品，並且還附讀在別人的私塾裏，可見那時生活還不差。祖父死了後，家裏過得不寬裕，他父親曾經以包戲爲生。也頻說：「我一直到現在都還要特別關心到下雨。」他描寫給我聽，說一家人都最怕下雨，一早醒來，趕忙去看天，如果天晴，一家大小都笑了；如果下雨，或陰天，就都發愁起來了。因爲下雨就不會有很多人去看戲，他們就要賠錢了。他父親爲什麼不

做別的事，要去做這一行事，我猜想也許同他的祖父有關係，但這猜想是靠不住的。也頻一講到這裏，他就更告訴我他有一個時期，每天晚上都要去看戲，我還笑着說他：「怪不得你對於舊小說那樣熟悉。」

稍微大了一點後，他不能在私塾附讀了，就在一個金銀首飾鋪當學徒，他弟弟也同時在另一家金鋪當學徒。鋪子裏學徒很多，大部分都在作坊裏，老板看見他比較秀氣和伶俐，叫在櫃檯上做事，收拾打掃鋪面，替掌櫃、先生們打水、鋪牀、倒夜壺，來客了裝煙倒茶，實際就是奴隸。晚上臨時搭幾個凳子，在櫃檯裏睡覺。冬夜很冷，常常通宵睡不着。當他睡不着的時候，他就去想，在他的腦子裏裝滿了疑問，他常常做着夢，夢想能夠到另一個社會裏去，到那些拿白紙旗、遊街、宣傳救國的青年學生們的世界裏去。他厭棄學打算盤，學看真假洋錢，看金子成色，尤其是討厭聽掌櫃的、先生們向顧主們說各式各樣的謊語。但他不特不能離開，而且侮辱更多的壓了下來。在夜晚當他睡熟了後，大的學徒跑來企圖侮辱他，他抗拒，又不敢叫喚，怕驚醒了先生們，祇能死命的去抵抗，他的手流血了，頭碰到櫃檯上，大學徒看見不成功，就恨恨地尿了他一臉的尿。他爬起去洗臉，尿、血、眼淚一齊揩在手巾上。他不能說什麼，也無處可訴苦，也不願告訴父母，祇能隱忍着，把恨埋藏在心裏，他想，總有一天要報仇的。

有一天，鋪子裏失落了一對金戒子，這把整個鋪子都鬧翻了，最有嫌疑的是也頻，因為戒子是放在玻璃盒子內，也頻每早每晚要把盒子拿出來擺設，和搬回櫃子裏，他又很少離開櫃檯。開始他們暗示他，要他拿出來，用各種好話來騙他，後來就威脅他，說要送到局子裏去，他們罵他、羞辱他、推他、敲他，並且把他捆了。他辯白、他哭、他求過他們，一切都沒有用，後來他不說了，也不哭了，任憑別人擺佈。他心裏後悔沒有偷他們的金戒子，他恨恨的望着那些首飾，心裏想：「總有一天要偷掉你們的東西！」

戒子找出來了，是掌櫃的拿到後邊太太那裏去看，忘了拿回來。他們放了他，誰也沒有向他道歉，但是誰也沒有知道在這小孩子的心裏種下了一個欲望，一個報復的欲望。在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月，這個金鋪子的學徒失蹤了，同時也失蹤了一副很重的大金釧。金鋪子問他的父母要金釧，他父母問金鋪子要人。大家打官司、告狀，事情一直沒有結果。另一家金鋪把他弟弟也辭退了。家裏找不着他，發急，母親日夜流淚，但這學徒卻不再出現在福州城裏。

也頻懷着一顆愉快的、顫慄的心，也懷着那副沈重的金釧，皇皇然搭了去上海的海船，他睡在艙面上，望着無邊的翻滾的海浪，他不知應該怎麼樣，他曾想回去，把金釧還了別人，但他想起了他們對他的種種態度，可是他往那裏去呢？他要去做什麼呢？他就這樣離

開了父母和兄弟們嗎？海什麼都不能告訴他，白雲把他引得更遠。他不能哭泣，他這時大約纔十四五歲。船上沒有一個他認識的人。他得想法活下去。他隨着船到了上海。隨着船上的同鄉住到了一個福州人開的小旅館。誰也相信他是來找他舅舅的。很多從舊戲上所得到的社會知識，他都應用到了。他住在旅館裏好些天了，把平素積攢下來的幾個錢用光了，把在出走前問他母親要的幾塊錢也用光了，「舅舅」也沒找着，他去找事做，或者還當學徒，他一直也沒有敢去兌換金釧，他總覺得這不是他自己的東西，他決不定究竟該不該用它。他做了一件英勇的事情，卻又對這事情的本身有懷疑。

在小棧房的來客中，他遇到一個比他大了一兩歲的男孩子，他問明白了他是小有天酒館的少東家，在浦東中學上學。他們做了朋友，他勸他到浦東中學去，他想起了他在家裏所看見的那羣拿白紙旗的學生來。他們懂得是那樣的，他們曾經在他們鋪子外講演過，他們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條約二十一條，他們是和金鋪子裏的掌櫃、先生、顧客完全不同的人，也同他的父母是不同的人，雖然他們年紀小，個子不高，可是他們都使他感覺是比較高大的人，是英雄的人物。他曾經很嚮往過他們，現在他可以進學堂了，他是向着他們的道路走去，是向一個有學問、為國家、為社會的人物的道路走去，他是多麼的興奮，甚至不敢有太多的幻想呵！於是他兌換了金釧，把大部分錢存在銀行裏，小部分交了

學費，交了膳費，還了旅館的債，他脫離了學徒生活，他曾經整整三年在那個金鋪中；他脫離了一個流浪的乞兒生活，他成了一個學生了。他替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胡崇軒。這大約是一九二〇年春天的事。

他在這裏讀書有一年多的樣子，他的行蹤終究被他父親知道了。父親從家鄉趕到上海來看他，他不能責備他，也不能要他回去，也頻如果回去了，首先得歸還金釧，這數目他父親是無法歸還的。他祇得留在這裏讀書。父親也爲他想了一個辦法，託同鄉關係把他頻送到大沽口的海軍學校，那裏是免費的，這樣他不特可以不愁學膳費，還可以找到一條出路。這樣也頻很快就又變成一個海軍學生了，他在這裏學的是機器製造。他一點也沒有想到他會與文學發生關係，他只想成爲一個專門技術人材；同時也不會想到他與工人階級革命有什麼關係，他那時似乎很安心於他的學習。

當他的錢快用完時，他的學習就停止了，海軍學校停辦。他到了北京，他希望能投考到一個官費的大學。沒有成功，他又不能回家，又找不到事做，他就流落在一些小公寓裏。有的公寓老板簡直無法把他趕出門，他常常幫助他們記帳、算帳、買點東西，晚上就替老板的兒子補習功課。他有一個同學是交通大學的學生，這人是一個地主的兒子，他很會用地主剝削農民的方法和也頻交朋友，他因爲不願翻字典查生字，就叫也頻替他查，預備功課，

也頻就常常每天替他查二三百生字，從東城到西城來。有時就留也頻吃頓飯，還不斷的把自己的破襪子舊鞋子給也頻。也頻也就把他當着唯一的可親的人來往着。尤其是在冬天，他的屋子是暖和的，也頻每天冒着寒風跑來後，總可以在這暖和屋子呆幾個鐘頭，雖然當晚上回去時街道上還是奇冷。

除了這個地主兒子的朋友以外，他還有一個官僚兒子的朋友也救濟過他。這個朋友，是同鄉，也是同學，海軍學校停辦後，因為肺病，沒有繼續上學，住在北京家裏休養，父親是海軍部的官僚。這個在休養中的年青人常常感到生活的寂寞，需要有人陪他玩，他常常打電話來找也頻，也頻就陪他去什剎海，坐在蘆席棚裏，泡一壺茶。他喜歡舊詩，也做幾句似通非通的詠蓮花、春夜有感的七絕和五言律詩，他又也要也頻和他。也頻無法也就只得胡謔。有時兩人就在那裏聯句。鬼混一天之後，他可以給也頻一元錢的車錢。也頻卻走了回去，這塊錢就拿來解決很多問題。一直到也頻把他介紹給我聽的時候，也頻還覺得他是一個很慷慨的朋友，甚至常常感激他，因為後來也頻有一次被公寓老板逼着要帳，也頻又害了很重的痢疾，去求他的時候，他曾用五十元大洋救出了也頻，可惜我一直沒有見到過，那原因還是因為我聽了這些故事之後，曾把他這些患難時的恩人罵過，很不願意也頻再和他們來往，實際也有些過激的看法，由於生活的窄狹，眼界的窄狹，就有了那末窄狹的情

感了。

窮慣了的人，對於貧窮也就並沒有什麼恐慌，也煩到了完全無法應付日子時候，那兩個朋友一些小小施與只能打發幾頓飯，打發一點剃頭、一點鞋襪而不能應付公寓的時候，他就把一件舊夾袍、兩條單袴往當舖裏一塞，換上一元多錢，搭四等車、四等船跑到煙臺去了。煙臺也有一個他的同學的哥哥在那裏做官。他就去做一種極不受歡迎的客人。他有時陪主人夫婦吃飯，主人要是有另外的客人，他就到廚房去和當差們一道吃飯。主人看見是兄弟的朋友，不便馬上趕他走，他自己也沒有什麼不安，他還不能懂得許多世故，以為朋友曾經這樣約過他的，他就不管。時間很長，他一個人拿幾本從北京動身時借的小說到海邊上去讀。

蔚藍的海水是那樣的平穩，那樣的深厚，廣闊無邊，海水洗去了他在北京時那種嗷嗷待哺、亟亟奔走的愁苦，海水給了他另一種雄偉的胸懷。他靜靜的躺在大天地中，聽柔風與海浪低唱，領會自然，他更任思緒縱橫，把他短短十幾年的顛簸的生活，慢慢在這裏消化，把他僅有的一點知識在這裏凝聚，他感到了所謂人生了。他朦朧的有了些覺醒，他對生活有了些意圖了。他覺得人不祇是求生存動物，人不應受造物的捉弄，人應該創造，創造生命，創造世界。在他的身上，有了新的東西的萌芽，他不是一個學徒的思想，也不是

一個海軍學生的思想，他祇覺得他要起來，與白雲一同變幻飛躍，而與海水一道奔騰。於是他做衣、跳足，遨遊於煙臺的海邊沙灘上。

但這樣的生活是不會長久下去的。主人不得不打發他走了。主人送了他二三十元的路費，又給了他一些庸俗的箴言，好像是鼓勵他，實際是希望他不要再來了。他拿了這些錢，笑了一笑，又坐上了四等艙。這一點點錢又可以使公寓老板把他留在北京幾個月。他是非常喜歡這些老板，覺得他們都是如何寬厚的人呵！

北京這個古都是一個學習的城，文化的城，那時北京有晨報副刊，後來又有了京報副刊，常常登載着一些名人的文章。公寓裏住的大學生們，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崙、濟慈的崇拜者，魯迅的崇拜者，這裏常常談起莫泊桑、契珂夫、易卜生、莎士比亞、高爾基、托爾斯泰……而且這些大學生們似乎對學校的功課並不十分注意，他們愛上舊書攤，上小酒館，遊覽名勝，愛互相過從，尋找朋友，談論天下古今，尤其愛提筆寫詩、寫文，四處投稿。也頻在北京住着，既然太閒，於是也就跑舊書攤（他無錢買書，就站在那裏把書看個大半），也就讀起外國作品來了。房子裏還把小說月報上一些套色畫片剪了下來，貼在牆上。還有準備做詩人的一些年青人，也稍稍給他一些眼光，和幾句應酬話。要做技術專家的夢，已經完全破滅，在每天都可以餓肚子的情況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學、浪漫主

義的生活情調與藝術氣質，一天一天就侵蝕着這個孤單的流浪青年，把他極簡單的腦子引向美麗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且與他的現實生活並不配襯。

一九二四年，他與另外兩位熟人在京報編輯了一個一星期一張的附刊，名為民衆文藝週刊。他在這上邊用胡崇軒的名字發表過一兩篇短篇小說和短文。他那時是傾向於京報副刊、魯迅先生的，但他卻因為稿件的關係，一下就和休芸芸（沈從文）成了文章的知己。我們也是在這年夏天認識的。由於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經歷，看得出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猛、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雖說我還覺得他有些簡單，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卻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質的人。他還是一塊毫未經過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燒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我們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誼。

我那時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亂的時候，有着極端反叛的情緒，盲目地會傾向於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疏遠了革命的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懣、掙扎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給也頻的影響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傷感與虛無。那一個時期他的詩，的確充滿了這種可悲的感情。我們曾經很孤獨的生活了一個時期。在這一個時期中，中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在南方如火如荼，而我們卻蟄居北京，無所事事，也頻日夜鑽進

了他的詩，我呢，祇拿煩悶打發每一個日子。現在想來，該是多麼可惋惜的呵！這一時期如果應該受到責備的話，那是應該由我來負責的。因為當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已經老早就進過共產黨辦的由陳獨秀、李達領導的平民女子學校和後來的上海大學。在革命的隊伍中是有着我的老師、同學和摯友。我那時也曾經想南下過，卻因循下去了。一直沒有什麼行動。

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四一二、馬日事變等等纔打醒了我。我每天聽到一些革命的消息，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艱苦中堅持，也有朋友動搖了，我這時纔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麼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祇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了，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卑視和個人的孤獨的靈魂的倔強。我的苦痛，和非常想衝破舊的狹小圈子的心情，也影響了也頻。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們都帶着一種朦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開始的時候，我們還祇能個人摸索着前進，還不得不把許多希望放在文章上。我們兩人加上沈從文，就從事於雜誌編輯和出版工作。把雜誌和出版處都定名為紅黑，就是帶着橫豎也要搞下去，怎麼樣也要